

国际社会工作实践研究 会议系列宣言

邓锁* 译

译者按 国际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会议第一届会议于 2008 年在英国索里斯堡召开，之后分别在芬兰的赫尔辛基（2012）、美国的纽约（2014）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17）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会议主办方在每次会议结束之后征集学者建议，发布关于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会议宣言。我们编选了前三届的宣言，将其翻译成中文发表，期望对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的讨论和发展有所启示。

实践研究——索里斯堡宣言（2008）

一 背景

迈入 21 世纪，面临日益严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专业人员被期

* 邓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待进行更加有效的实践。证据为本实践 (evidence-based practice) 的广泛关注即是对这一期待的主要回应。然而,在当前的研究取向下,通常无法产生应用于不同情境之实践的充分证据或知识。如何对专业实践进行更好的研究,从而为改善实践工作提供一个好的基础呢?这个问题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不同国家和不同的专业则试图以相似或相异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

对此问题范畴的梳理乃是推动更好实践研究的重要任务。2008年6月,一群对此感兴趣的专业人员聚集在英国的索利斯堡 (Salisbury) [由南安普敦实践研究推动网络小组 (SPRING) 所召集], 希望通过拟定一个实践研究的国际宣言来推动这项工作。这个小组由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包括北欧、意大利、加拿大、美国、以色列、新加坡以及英国等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所构成^①。他们也随后成为“索利斯堡论坛”小组的主体参与者。尽管主要来自社会工作界,但是这一小组成员力图拟定出一个宣言,使其可以更广泛适用于所有重视对实践进行研究的

专业。本宣言并非决定性或结论性的,而是旨在这个时间点,在实践研究正在不断发展的时期开始描绘其轮廓。本宣言尝试使用更加包容性的语言,承认多元的视角和差异性,并希望它可以成为今后持续讨论的基础。起草这一宣言,也旨在使来自不同国家和情境下的各类专业人员能够将其用于深化实践研究的思考和立场,增加实践研究的知识积累,以最终产生更多、更有质量的实践研究成果。

二 索利斯堡宣言——实践研究:其重要性何在?为何现在提出?

当前的世界情形需要有效的专业实践工作。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对于责信 (accountability) 提出更多要求,然而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使得责信的实现变得尤其困难。这需要在实践的研究方式上进行转向,

^① 译者注 “practice” 在社会工作领域中被译为“实务”或“实践”,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比前者在理论层次的概念内涵更加丰富,因此本文采纳“实践”(practice)、“实践研究”(practice research)的译法。而“practitioner”一般具有专业领域从业者的特定意义,则采用“实务工作者”的译法。

以便在复杂及不确定情境下，提供更好实践的相关知识。

主流假设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相信研究可以导向实践。然而，研究同样需要具有实践思维（practice-minded），以能更好地探究和发展来自复杂实践自身的知识。实践研究的概念，因其致力于增进我们对于研究这一复杂性的最好方式的理解，对实践领域和研究领域之间的平等对话给予充分关注。尤其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在对责信提出新的要求的同时，人们也质疑科学知识能否作为改善实践工作的唯一基础，这一对话因而显得十分重要。

（一）何为实践研究？

目前对于“实践研究”的定义并没有明确的共识，甚至常常被其他相关概念如“实务工作者研究”（practitioner research）所替代。以下对于实践研究的界定陈述，体现了其细节性的含义：

……实践研究源自对于实践的好奇心。它关注识别助人的良好且可行的方式，通过对实践的严格检验以及在经验中反映出的新观念之发展，挑战不良的实践工作。我们认为实践研究最好由实务工作者与研究人员合作进行，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相互学习。实践研究采纳专业知识的包容性取向，它强调对于实践复杂性的理解，通过实践来促进对于增权的承诺以及对于社会正义议题的回应。

实践研究包括与专业实践直接相关的知识产生，并因此通常包含来自实践本身直接产生的扎根性知识。下文的叙述则讨论到其特定层面的含义。

显然，连接实践和研究的思考以及做法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中，已呈现某种特定的历史发展路径（如个案研究取向在早期一些国家中被视为对实践进行研究的方法）。其当代的含义则转向如何弥合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之间的差异。

下列具体的议题涉及如何最好地弥合这一差异。

- 实务工作者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到实践研究中？这个问题包括：实务工作者是否可以同时作为知识的使用者和创造者，以及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必须介入研究中，才能产生有意义的实践研究？

- 是否所有对于专业工作者有用的研究都是实践研究，或者说，是否还有其他类型的研究在开展有效实践所必需的？

- 如何理解实践？实践的不同方面（如不同的类型、方法、实践环境等）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实务工作者如何使用以及发展知识（以及知识的类型）是一个核心问题。复杂实践经验的性质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可以通过研究得以最佳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实践研究应当能够反映日常实践所关注的问题。

- 如何理解研究的概念，也即支撑研究的特定认识方式（认识论），以及如“严谨性”（rigor）以及“可信赖性”（trustworthiness）等概念如何与之相关。尤其是，研究的概念可能允许通过日常实践经验来进行知识的创造，“探知”（inquiry）或者“具备研究思维的实践”（research-minded practice）可能是更加适合的概念。

- 如何理解知识的概念则是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具体来说，其核心关注的议题是：实践研究聚焦于什么类型的知识，以及其是否应当凸显实践的默会（tacit）/隐性（implicit）的维度？

- 实践研究如何与其他学科（如社会科学）或者主导性专业（如医学）的研究相关联，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包括：是否实践研究只是简单地对其他研究的移植或修正，或者说，是否有必要发展新的、不同的范式/方法？

（二）为何进行实践研究？

一般且简单地说，实践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产生相关的专业知识以直接改善实践工作。然而，对这一含义的理解包含多重的复杂视角。

- 实践研究为谁而进行？参与其中的不同群体（实务工作者、服务使用者、学界、研究者、政策决定者、管理者、公众）可能存在冲突性的利益。谁需要优先考虑，以及实践研究是否必须总是直接惠及（以及纳入）服务使用者？不同的视角在这些议题上会存在差异。

- 实践研究的驱动力。这也与上述问题相关，诸如：实践研究是否必须由来自实践中的关切所驱动，抑或较少直接来自实践的关切也可以成为一种驱动力？这两个问题会带来不同的视角。

- 实践研究的价值基础。其是否直接关联于相关专业的价值基础[也即对于社会工作而言，是否应当致力于追求更大的正义（社会的与个人的）]？

• 对于实践与研究之间的关系发展，以下是一些重要的原则/实践:

- ◆ 合作
- ◆ 参与
- ◆ 伦理反思性和批判性反思
- ◆ 情境性 (contextuality)
- ◆ 研究的动态性、流动性或关系性特征

• 实践研究可通过产生独特的知识和专业能力而贡献于专业发展。

(三) 如何开展实践研究?

哪些方法与实践研究相关? 我们承认实践研究的驱动应当来自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和疑惑, 那么是否存在具有偏好性的特定方法论或方法呢?

在继续探寻研究实践复杂性方式的过程中, 既有的以及新的方法都可能是相关的。在发展研究范式时, 采用一种包容性的取向 (承认多元的视角) 至关重要, 因而很少运用纯粹的定量或质性的单一视角。实践研究经常需要创造新的方法或者创新性地运用既有的方法, 它与合作、复杂性、对话、关系性以及情境性等原则是一致的。例如, 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 或者对反思 (reflection) 及反身性 (reflexivity) 的运用, 或许能够使其较容易贴近实践研究的目标。

如果要促成实践和研究之间的动态对话, 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从实践中直接产生研究问题及疑惑的方法, 以及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之间的相对角色。在研究过程中, 各方 (实务工作者、学界、服务使用者、政策制定者、管理者) 如何基于其特定的立场和专业能力做出不同的 (或相似的) 贡献?

(四) 下一步是什么?

进一步推动实践研究需要我们现在做什么?

• 支持实践研究的结构、过程和条件——根据不同利益群体及可用资源的差异, 我们需要多种差异性的结构和条件。许多国家已经进行了不同的尝试 [如芬兰的卓越中心 (Centers of Excellence), 北欧国家在政府、学界以及服务使用者之间建立的伙伴关系等]。在组织内部, 则需要提供支持实践研究观点交流的空间 (包括物理意义上、智力意义上以及对时间的预留)。还应当发展促进实践研究的社会资本, 鼓励教育

界培训更具研究思维的实务工作者，以及更具实践思维的研究者。

- 研究资助机构需要承认这种研究实践的新模式。
- 新的范式/认识论，或许需要发展出一种探讨实践研究的新形式，以反映其新的特性。

- 对行动的呼吁。我们需要进一步系统性及合作性的行动，教育界、实务工作者、研究者、管理者以及雇主都在发展实践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多元领域中的合作努力因而是十分重要的。

只拥有资源和结构是不够的，我们尚需一种支持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参与的文化，其中大家可以尊重及交流彼此不同的能力，认可各自在推动更具普遍化知识发展上所面临的挑战，尊重特有的及地方性的知识。

对于实践研究概念的推动，重要的是需要持续的行动，并从这些实践行动中不断增进我们的认识。

实践研究——赫尔辛基宣言（2012）

自 2008 年以来，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实践以及支撑社会福利的社会结构都已经发生许多变化。2012 年，社会工作的研究者齐聚赫尔辛基，试图重新审视实践研究的发展，并对索利斯堡宣言进行更新。

一 实践研究形势的变迁

实务工作者与研究者有共同的兴趣，都会想办法来改善社会工作的实践。这一过程关注设计和传递有效的社会服务，持续寻求更好、更有效的助人方法。毫无疑问，实践工作有些方面需要改进，而且也很清楚研究在探寻实践工作改进方式上能够发挥重要的角色。由于社会工作者往往服务于弱势且无权的人群，包括需要保护的儿童、有学习障碍的成人或遭受虐待的老人等，这一探寻过程因而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在这一情形下，证据为本的政策与实践似乎提供了获知更有效做法的希望，然而在现实中很少如此。在许多领域里，我们并没有足够数量和高质量的研究来确定性地了解什么是有效的。

席卷许多西方福利国家的金融危机导致服务和研究相关的财政支出日益缩减。在这样一个时期，了解什么是有效的实践变得愈加重要

(因为财政紧缩的原因),而我们有有助于实践的研究却并没有跟上。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境下,我们需要改善实践的相关知识。这一现实状况强化了以下需求,即我们必须从实务工作者的经验与专业知识中获知何为研究的重点,以及透过研究改善实践的最佳方式。举例来说,“数据挖掘”(data-mining)方法的发展显示出实务工作者能够在日常工作中运用所搜集到的相关信息来改善实践。

自2008年以来的另一个发展是,实践研究的数量显著增加。许多研究表明,大学和实践为本的研究(practice-based research)之间的关系已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呼吁提高实践研究的标准。北欧的实践研究着重于探讨研究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范畴,而北美的研究则强调为具备研究意识的专业工作者提供组织性的支持。

这些发展呼吁我们增进对实践研究的各类活动以及实践和理论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进一步了解。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处于变迁中的福利结构以及福利经济进行持续分析,以便在资源缺乏的背景下更有效地推动实践研究。

二 实践研究之哲学和方法论的演化

实践研究并非一个特定的研究方法,而是实践和研究之间的交会点,并且在每次试图建立这样的交会点时都需要双方进行协商。本质上,实务工作者不会变成研究人员,研究人员也不会变成实务工作者,重要和有意义的是两者视角之间的交流。

实践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需要灵活和协作性的结构与组织。因此实践研究无法由一个单一的哲学或方法论所描绘,而需要在一个充满支持和弹性的组织情境中,生发出自身的理念和方法论来定义以实践为本的知识。至少有两种取向可以用来回应这一挑战,即“具体性科学”(science of the concrete)和“第二模式的知识生产”(Mode II knowledge production)。

具体性科学可谓是务实、多变化和情境相关的科学,它包括下列基本元素:

- 贴近现实(贴近调查现象的研究);
- 强调微小事情(研究小细节中的大学问);
-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观察实践活动和知识;

- 研究具体的个案与脉络（研究方法论是与情境相关的）；
- 加入行动者和结构（同时着重于行动者层次和结构层次）；
- 与多元声音对话（研究是对话性的，没有人可以声称拥有最终决定权）。

具体性科学包括与被研究者、其他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场域中的其他核心行动者之间的对话。相较于只依靠学术规范引导的传统研究取向，实践研究同时包含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观点，多元的合作伙伴乃至一般人都可以参与到对研究的讨论和评估中。这一过程在公共领域中展开，它涉及许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其中每个人代表不同的利益，贡献出多元的能力和态度。

第二模式的知识生产同样基于多方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每个人代表不同的利益，贡献多元的能力和态度。它是一个具有合作取向的结构和网络，处于一个具有组织弹性的环境中。第二模式的知识生产中包含对于知识发展、研究设计及数据分析的多重且差异化的期望，但第二模式的知识生产并非专注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可能冲突，而是寻求需求和利益不同者之间的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合作方同意在参与过程中持续反思彼此的差异。

三 作为一种协商理解的实践研究

社会工作实践涉及各种关系、互动以及互惠性活动，实践研究则需要处理研究方法、相关理论与社会工作实践特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研究反映了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也反映了研究者和服务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实践研究就其本质来说是关系性的，其知识发展来源于实践、行动和经验。

基于对具体性科学和第二模式知识生产的理解，实践研究因此可以被定义为：

1. 其聚焦于：

- 描述、分析和发展实践的批判性研究；
- 以研究者、实务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的好奇心、批判反思以及批判性思考为焦点的过程；
- 在研究的规划、产生以及推广过程中，研究者/研究与实践者/实践两种环境之间所建立起的一种具有亲密、联结性、投入且本地性

的合作关系；

- 参与和对话为基础的研究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在伙伴关系之中的实践发展以及对于不同专业知识有效性的验证。

2. 其所用方法论反映如下特点：

- 遵循学术标准的研究；
- 建立于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经验、知识和需求的研究；
- 通过与服务使用者及实践的对话，对研究发现进行诠释和推广；
- 反映实践中的学习过程；
- 回应具体以及实际问题的社会工作研究；
- 以新的方式挑战实践的研究（包括经验性、探索性、解放性以及理论性的研究）。

研究者、实务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都有责任对以上的定义进行讨论和沟通，界定需要被讨论的议题以及对结果进行解释。每个人（研究者、实务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在知识生产、推广以及使用的过程中贡献自身的经验和专长，这一过程以协商理解为基础，每一方都能够有所贡献，在协作过程中每一方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 实践研究和厚实研究的目标

2012年会议的主题提到创立“厚实”（robust）的实践研究，会议论文也相当注意实践研究中“厚实”的意义。厚实研究（robust research）的概念必须在社会工作实践的情境脉络下来理解，其中包含了许多雄心勃勃的议题、更多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更为复杂的改变过程。需要认识到，社会工作实践的特性被其所处情境脉络及结构条件所形塑，同样，实践研究也形塑着其自身和周围的环境。致力于产生更具社会关联性知识的实践研究需要对这一情景脉络进行反思。

历史上，社会工作实践由其所处机构之使命与价值观，以及影响组织的社会政策所形塑。实践工作是复杂的，且经历不断的变化，因此实践研究需要反映出这些复杂性及其对实践的影响，才能研究和了解它们。然而，这不仅仅是研究事物的演变或者实践如何进行的问题，也包括了如何改善服务、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改善以及变迁如何对行动者及其网络构成产生影响。

由于实践研究与“具体性科学”相关，这一情境敏感性的视角可以被视为产生社会厚实型知识（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的先决条件。实践研究把描述、解释以及理论化实践工作的兴趣结合起来，将知识作为提升实践的工具、通过检验探索新的工作方式。由此，我们能够确保研究的结果是相关且服务于实践的，同时也参与到知识的发展中。

社会厚实型知识是第二模式科学的核心要素，在这里，知识生产要求超越有效性的问题，而将重点放在社会厚实型知识的关系性维度，即对价值观和利益的考量及反思性分析回应哲学意义上的实践（praxis）问题，并由此倡导将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置于认知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之上，以便生产重要的知识。

厚实性（robustness）概念强调的不仅是研究过程，也包含实践脉络和文化差异，以及知识生产所促成的改变，后者乃是通过与实践工作的对话，将研究发现进行推广，反映出—个习得的过程。实践研究的社会厚实性获得，可包括下列内容：

- 协商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
- 将知识散播融入研究策略中；
- 考虑到研究中所嵌入的价值观、情感以及政治的维度；
- 策略性地选择合作伙伴；
- 在更大范围以及外部的网络中进行研究成果的验证。

这一过程中的—个核心问题是发掘有意愿参与到共同实践机会、实践可能性以及/或相关实践主题的行动者与利益相关者，它包括有意识地邀请不同行动者参与，从研究起始即鼓励争论等。

五 立足过去探索未来

《赫尔辛基宣言》的出台是一个创新性的过程，它突出之前实践研究会议中的讨论重点，并为2014年即将在纽约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奠定了基础。在过去四年（2008~2012年）中，这群有远见的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已为实践为本的研究确立了新的基石，它植根于社会工作者及其所服务人群的日常经验。

赫尔辛基会议的主题聚焦于如何产生更具“厚实性”研究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学院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研究相伴随，并增强了后者的

严格性及实践应用性。在这一方面，会议特别提到数据挖掘方法（data-mining approach）对于运用社会服务机构已有的行政及个案记录等相关数据上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一会议也关注到实践研究与赫尔辛基大学所开创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Cultural 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CHAT）框架的关系。在这些积极的视角激励下，本次会议扩展了实践研究的哲学与方法论，提出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如何相互启发的新议题。

这份《赫尔辛基宣言》的目的是反映实践研究的当前状况，并引导其未来的发展。赫尔辛基会议所提出的下列几个相关主题值得进一步的关注和分析，包括：

1. 吸引更多有兴趣的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参与到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相关议题中，这些议题如下：

- 对公共政策的思考：如何把实践研究的成果转化成新的、与服务使用者更相关的政策和做法？

- 对不断变化的实践工作情境的思考：如在世界各地许多政府所出现的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整合影响下，实践研究可以提供哪些知识？

- 整合更高层的管理，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提供所必需的组织化支持；

- 邀请其他研究同人采用一种跨学科的方法来推广和运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以多方行动者取向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工作研究的传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2. 使更多社会工作教育者和研究者一同参与，探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方法论对于教育未来实务工作者可发挥的作用，相关议题包括：

- 扩展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范围，积极纳入服务使用者，与主要由服务使用者所进行的幸存者研究（survivor research）进行连接，参与到相关的跨学科对话；

- 通过积极运用批判性反思和批判性思维，参与到将实践问题转化为实践研究问题的过程（教育未来具备研究思维的实务工作者）；

- 让研究者参与到对应用性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以便在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范畴中找到其定位（教育未来具备实践思维的研究者）。

实践研究——纽约宣言（2014）

索利斯堡和赫尔辛基会议的主题可以成为纽约会议的一个框架，用来探索建立实践和研究之间的双向桥梁，以应对下列这些历来壁垒分明之活动间的连接阻碍：（1）管理者对于实践研究能否有助于产生可用以改善实践的证据方面的兴趣；（2）推动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之间在改善实践的过程中的平等关系；（3）弥合证据为本的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通常依赖随机控制实验）和证据启发的实践（evidence-informed practice）（通常依赖一系列非实验性方法，包括临床的数据挖掘）之间的差异；（4）促进多元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研究者、教育者、政策制定者等），其中民主参与理论可作为实践研究学术面向的基础。

纽约会议广泛地邀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参与者，包括教育工作者、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并且引入跨学科的视角。丰富的会议研讨弥合了不同方法论之间的差异，也提出相关的问题，如通过研究过程而建立的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和协商，如何能够增进个体及组织层面的知识建立和发展。

纽约会议也指出实践研究的界定演化上还面临着以下挑战。

为实践研究提供基础性支持的重要性承认

这需要国家政策或能力认证标准来支持社会工作者在实践研究上的培训，同时也需要对于实践研究提供政府基金支持，以及为社会服务机构开展实践研究提供支持。

对服务使用者在进行和/或领导实践研究中应发挥重要角色的承认

服务使用者的意见会如何影响服务提供的性质？在应对服务参与/提供中的多重阻碍中，服务使用者如何能够与服务提供者建立联盟关系？

对实践的全球多样性的承认

目前大部分的研究过程都只关注微观的实践工作，而如果从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全球视野来审视的话，实践会有何种差异？在不同的情境下（自然灾害、环境可持续性、污染、社会发展等），实践又会体现何种差异？

发展组织化结构以支持多种形式的学习网络

这包括采用新的方法来建立信息和对话网络，例如，（1）举办国际研讨会；（2）知识推广（跨区域性的期刊）；（3）开放性出版之外的技术和社交媒体的运用、服务使用者的经验为基础的知识，以及运用新的方式来回应英语之外多种语言的需求。

从2008年《索利斯堡宣言》开始，过去六年间在探索和定义实践研究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或许当前可以提出实践研究所面临的以下系列挑战，以期对即将于香港召开的2017年会议及之后的相关讨论提供指引。

- 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对话方法的扩展，从早期对实务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到关注多元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服务使用者、教育者、机构管理者以及政策制定者；

- 阐明、完善和运用与实践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将其作为工具，通过多种形式的对话和伙伴关系发展，增进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声音表达；

- 利用反思性的研究方法，如实验和创新研究，来促进具有合作创造性的知识生产；

- 通过持续的对话和共享价值创造，来回应服务使用者和一般民众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及回应日益变迁的多样化社会工作实践；

- 支持学习过程，其中社会工作者同时作为实践研究的使用者和生产者，从而贡献于新形式的社会工作实践；

- 明确管理者和决策者对于实践研究的组织和财政支持，以便在服务传递环境中将这种知识发展形式制度化；

- 将实践研究的对话扩展至全球范围，包括非洲、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等地的参与者；

- 推动实践研究者参与到新兴实践领域（如灾害救援）的扩学科发展中；

- 教育下一代的实务工作者、实践研究人员与服务使用者建立伙伴关系；

- 推动具有社会工作独特性之不同方法论的争论与分化（如社会工作与行动研究、案例研究、实验法、批判反思性以及证据参照的实践等的关系）。

尽管以上这些挑战为当前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方向指引，但众所周知，社会工作的实践环境处于持续的变化中。因此，对研究工作的最好规划也经常被经济、政府政策、进行中的研究、组织结构以及新一代实务工作者、服务使用者和研究者等的变迁所打乱。日益明确的是，实践知识的生产需要实务界和学术界的跨界行动，以便促进实务工作者的知识生产和推广。同样，也需要确保服务使用者的视角被纳入这一过程。

on how China make social policy innovation in the stage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ife policy; life issues; life protection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Research (1970 – 2010): The Way We Were
and the Way Ahead *Kieran O'Donoghue Ming-sum Tsui / 190*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upervision of practicing social workers published in peer-reviewed social work journals over a forty-year period (1970 – 2010) . Eighty-six articles were located and analysed by decade , location , research design , research participants , research focus and findings. Following this analysis , the 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is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the foundation it provide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uture research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ly based supervision models , the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supervision on client outcomes , as well as comparative cross-national studies on supervision.

Key words: social work supervision;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research on supervision

Special Topics

The Statement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Research
DENG Suo (Translated) / 209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research was held in 2008 in Salisbury , and then in Helsinki (2012) , New York (2014) and Hong Kong (2016) . After the conference ,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will release statements on practice research by collecting ideas and suggestions of participants. We selected three statements and translated them into Chinese. We hop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tatements will have great implications for the discu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research in China.

Call for Papers

/ 223